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二辑·第二卷)

[南北朝]刘义庆
(403年~444年)

社会教育思想与《世说新语》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二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
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6. 5

ISBN 7 - 80135 - 738 - 8

I. 中... II. 北... III. 教育名著 - 作品综合集 - 中
国文学 IV. I 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27 号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二辑
[南北朝]刘义庆社会教育思想与《世说新语》选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学苑音像出版社

★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1/32 印张: 195 字数: 5066千字

ISBN 7 - 80135 - 738 - 8

全二十册定价 526.00 元(册均26.30元)

(ADD 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 10 号信箱)

P. C. 100024 Tel 010 - 65477339 010 - 65740218(带 Fax)

E - mail: webmaster@BTE - book.com Http: //www. BTE - book.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外国卷 100 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200 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6 年 4 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第二辑·第二卷

[南北朝]刘义庆社会教育思想与《世说新语》选读

上 篇

刘义庆的生平与《世说新语》

- 刘义庆生平及学术活动 (1)
- 《世说新语》的书名、版本、批注和分类 (4)
- 《世说新语》与魏晋人物品藻 (9)
- 《世说新语》与魏晋玄学和清谈 (14)
- 《世说新语》与魏晋人文精神 (18)
- 《世说新语》与魏晋审美人生观 (27)
- 《世说新语》的道德观念 (32)

下 篇

《世说新语》选读

- 德行第一 (39)
- 言语第二 (69)
- 文学第四 (136)
- 方正第五 (195)
- 雅量第六 (236)
- 识鉴第七 (265)

上 篇

刘义庆的生平与《世说新语》



刘义庆生平及学术活动

《世说新语》一书，旧题为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著。

刘义庆生于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祖籍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后迁居丹徒之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刘义庆本来是刘道怜的次子，刘道怜是宋武帝刘裕的中弟，封长沙王。可是因为刘裕的幼弟刘道规没有儿子，便把刘义庆过继为嗣子。

这刘道规少年时便有大志，才能也在众宗室之上，深为刘裕喜爱。东晋后期刘裕征讨桓玄时，就是在刘道规的配合下，击败了桓玄。刘道规因此被封为振武将军、义昌太守。后来一直历任要职，不幸于义熙八年(412)病逝。刘裕建立南朝宋后，赠刘道规为大司马，追封临川王。本来宋文帝刘义隆小时候是由刘道规养大的，刘裕已经打算让刘义隆继承刘道规，可是大家都觉得按照礼教的规定，一个人不能同时继承两份家业。于是刘道规便把刘义隆还给刘裕，而将刘义庆定为继承人。

刘义庆幼年时候就受到宋武帝刘裕的赏识，刘裕常常拍着刘义庆的小脑瓜喜爱地说：“这是我们家的丰城宝剑啊(传说江西丰城地下藏有龙泉、太阿宝剑，后世常以“丰城剑”赞美杰出人才，或杰出人才有待识者发现，见《晋书·张华传》)！”十三岁的时候，刘义庆就袭封为南郡公，除给事，按谦让的规矩没有上任。义熙十二年(416)，刘义庆十四岁的时候，便跟随长辈讨伐长安，还拜辅国将军、北青州刺史，没上任，改为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复督淮北诸军事，等等。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十八岁时，袭封临川王，征为侍中。元嘉元年(424)，二十二岁时，转散骑常侍，秘书监，徙度支尚书，迁丹阳尹，

加辅国将军、常侍并如故。

当时有一个名叫黄初的老百姓,他的妻子赵氏失手将自己的儿媳妇杀死。这本来是死罪,遇到赦免没有处死,但却要押送到很远的地方,以防她的孙子为母亲复仇。对此,刘义庆上书说:“按照《周礼》的规定,像父母受到外人杀害这样的深仇大恨,一定要避仇海外。即使是在热闹繁华的市场相遇,也要刀兵相见。这是因为杀父杀母之仇,为莫大之仇,非报不可。可是家族内部亲人之间的骨肉相残,有时很难把道理讲得很清楚,所以常常要在法律之外裁以人情。而且礼制对于有过失的人也要宽恕,法律也没有与祖宗为仇的条文。况且赵氏这次杀人,本来是由于酒后失手,加上年老昏眊。哪能用她因年老昏眊而酒后失手,作为她戴枷长行,与孙为仇的理由呢?臣以为这位孙子如果能够含悲忍痛,与自己的祖母同天共域,既不违儿子的道义,也无亏于孝道。”这番话合情合理,赢得了大家的支持。

元嘉六年(429),刘义庆官加尚书左仆射。元嘉八年(431),有太白星碰犯了作为大臣象征的右执法星。按照迷信的说法,这对于为官的右仆射是不祥之兆。刘义庆担心会波及自己担任的左仆射,便请求辞官外镇。尽管宋文帝百般解释,说这种关于星象的解释有时也不见得那么准确。况且过去也曾出现过这种现象,也没有造成什么灾祸。可刘义庆死活就是不肯,没办法,刘义隆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还给他加封了中书令,进号前将军。

刘义庆在京城九年,出为使持节、都督七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这荆州地广兵强,物产丰富,几乎占朝廷的一半,所以宋武帝一直让自己的儿子镇守。刘义庆在宗室中名声很好,所以才会有此特例。他的性格谦逊,受到人们的爱戴,离任时很多人赠送礼物,他都一一谢绝。他所任之处,从未有过奢侈铺张的举动。只是他晚年热心佛教,为此却不吝钱财。他少年时就喜欢骑马,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和阅历的增长,他感到世路艰难,并不像骑马那样轻松,竟然不再跨马。可见他善于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天下宇宙的安危冷暖

相联系。

元嘉十二年(435),朝廷让内外群官向朝廷举荐人才。刘义庆上书举荐了武陵龚祈和处士师党。这两个人都是既有才学,而又心志高洁之士。举荐这样的人才,也可以看出刘义庆的人格追求和向往。元嘉十六年(439),刘义庆改授散骑常侍,都督数郡,任江州刺史。元嘉十七年(440),任南兖州刺史,寻加开府仪同三司。

刘义庆在广陵(今江苏扬州)的时候,不幸患病。那时正好有白虹贯城,野鹿入府。刘义庆是个迷信的人,见到这些所谓不祥之兆,心里十分恐惧,便执意要求返回。宋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回京后不久,元嘉二十一年(444),刘义庆在京城病故,时年四十二岁。朝廷追赠侍中、司空,谥号康王。

刘义庆不仅是一位王公贵族,而且也是一位文学家。

《宋书·刘道规传》在介绍刘义庆的文学事迹时,说他为人性格简素,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只是爱好文义。他的作品虽然不多,水平也还不算出类拔萃,但却足以成为诸位宗室的表率。刘义庆还利用他身为临川王和官居要职的特殊身份,大力招揽文学之士,不管远近,都尽力网罗。像太尉袁淑,在当时文名很盛。刘义庆在江州时将袁淑召为谏议参军。其余像当时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如陆展、何长瑜、鲍照,都是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代文学大家,刘义庆都将他们召在自己身边,委以官职,探讨文学,从而在自己身边形成了一个很有文学氛围的沙龙集团。因为这个缘故,就连宋文帝给刘义庆写信的时候,也要再三字斟句酌,生怕让刘义庆挑出什么毛病,见笑于大方之家。

根据《宋书·刘道规传》的记载,刘义庆著有《徐州先贤传》十卷。刘义庆祖籍彭城原属徐州,为徐州老一代贤达人士作传,表彰嘉言懿行,其中当然有着浓重的乡土之谊。又模仿班固《典引》著《典叙》,“以述皇代之美”,这应当是赞述宋王朝的建国历史。《南史·刘道规传》记载刘义庆的著作还有《集林》二百卷,这大概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类书。另外还著有《世说新语》十卷。除了《世说新语》之

外,他的其他著作都已经失传。

现存各种版本的《世说新语》的作者都署为刘义庆,其实这个提法还有些疑问。因为当时刘义庆在自己身边聚揽了很多著名文人,所以有人认为这部书也许不一定完全出自刘义庆之手,或许是他和身边那些文人一起编撰的。像本传中所提到的袁淑、何长瑜、鲍照等,都可能是《世说新语》一书的参与编撰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鲁迅所说的“裴郭二家”是指东晋时裴启所作的《语林》和郭澄之所作的《郭子》。因为《世说新语》书中采用了很多这两部书及郭颁《魏晋世语》、袁宏《名士传》的内容。这个说法虽然还不能成为定论,但为了解《世说新语》作者的一家之言,还是有些参考价值的。所以,从广义上说,《魏晋世语》、《语林》、《郭子》、《名士传》的作者都可以视为《世说新语》的原始作者;从狭义上说,刘义庆身边的那些文人也都有可能参加了本书的辑撰工作。刘义庆对本书的重要贡献也许主要在于组织和定稿的工作,所以称他为《世说新语》的主编还是没有问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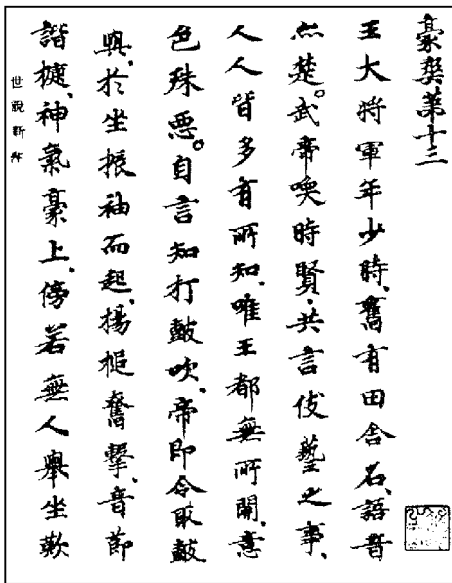
《世说新语》的书名、版本、批注和分类

《世说新语》一书曾有过《世说》、《世说新书》和《世说新语》三个名字。

《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本书著录为《世说》。本书唐代写本残卷的末尾,则写做《世说新书》。从宋代绍兴八年(1138)董彝刊本开始,本书书名一律写做《世说新语》。为什么会有这三个名字呢?清代以来,学者们开始注意

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多探讨,并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

清代学者认为,这部书的原名叫做《世说新书》,《世说》是《世说新书》的节略之语。理由是最早使用《世说》为书名的,是汉代刘向。他在校录古书时,凡是经过他手编次的,都在原书名的后边加上“新书”二字,以和未编前的旧本原名相区别。如《孙卿新书》、《晁氏新书》、《贾谊新书》等。《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了刘向《世说》一书,现已亡佚,但估计其体例不外刘向所作的《新序》、《说苑》之类,上述春秋,下记秦汉。刘义庆打算续写刘向《世说》一书,所以就沿用刘向的办法,把自己的书名取为《世说新书》,以和刘向的《世说》相区别。但从刘向以后古书名后凡有“新书”二字者,史书中往往予以省略,如《孙卿新书》,《汉书·艺文志》只题作《孙卿子》;《贾谊新书》,《汉书·艺文志》只题作《贾谊》,《隋书·经籍志》只题作《贾



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

子》等。按照这个惯例,《世说新书》从《隋书·经籍志》开始,也往往省称为《世说》(参见清黄伯思《东观馀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有关部分)。

至于《世说新语》这个名字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由什么人改定,已经不能确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不知何人改为《新语》,盖近世所传。然相沿已久,不能复正矣。”宋代汪藻《世说叙录》在《世说新语》书名下注释说:“晁文元、钱文僖、晏元献、王仲至、黄鲁直家本,皆作《世说新语》。”那么,把《世说新书》改为《世说新语》的时间,不会晚于宋代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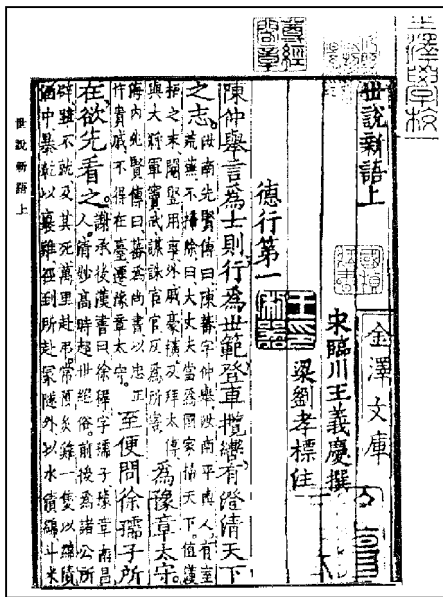
《世说新语》的版本流传,经过了几次大的变动。

史书上最早著录《世说新语》的是《隋书·经籍志》,上面说:“《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十卷,刘孝标注。”可以知道八卷本和十卷本是本书的最早版本。这两种版本都已经亡佚,只能根据有关材料进行推测。从《隋书·经籍志》上面的话来看,八卷本很可能是刘孝标没有加注以前的原本。至于十卷本,唐代写本的《世说新书》残卷保存了该书从“规箴”第十到“豪爽”第十三共四个门类。其卷末标明“《世说新书》卷第六”。这个版本包括刘孝标的注,而从卷六处于第十至第十三门类的位置来看,它很可能就是十卷本的传本。但是它的全貌,仍不得而知。此本原藏日本,近代人罗振玉曾将其影印出版。

北宋时期,晏殊曾对十卷本《世说新语》进行了整理,删去了与前九卷重复的第十卷共九篇,但这个版本今天也已经失传(参见董葬《世说新语跋》)。南宋绍兴八年(1138),董葬在晏殊整理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加工,这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宋绍兴刻本。但这个版本并非原书,而是日本尊经阁丛刊中所影印的宋绍兴八年董葬刻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和中华书局分别于1955年和1962年将此本影印出版。这个版本分三卷,书后有汪藻所撰《叙录》两卷,包括《考异》和《人名谱》各一卷。另外,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陆游也曾刻

印过《世说新语》,已经失传,明代嘉靖年间吴郡袁纲根据陆游刻本重雕。此本也分三卷,但每卷又分上下。这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嘉趣堂本。清代道光年间,浦江人周心如又将嘉趣堂本重雕,对袁本稍有刊正,这就是今天流传的纷欣阁本。光绪年间长沙王先谦又据纷欣阁本传刻,后面附有王先谦所作的《校勘小识》和叶德辉所编的《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以及从唐宋人类书中辑录出来的《世说新语佚文》,这就是思贤讲舍本。还有,清代徐学乾传是楼所藏宋淳熙十六年(1189)湘中刻本,与董莽刻本相近而与嘉趣堂本有很大区别。沈宝砚有校记,见涵芬楼影印嘉趣堂本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除了曾将宋代绍兴八年董莽刻本影印出版外,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将思贤讲舍本影印出版,后面附有董刻本后的汪藻《叙录》和罗振玉影印的《唐写本世说新书残



宋绍兴八年(1138)刻本

卷》。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此本系以思贤讲舍本为底本,以董弅刻本、嘉趣堂本、沈宝砚本对校。其笺疏重点不在训解文字,而主要注重考案史实。对《世说新语》原书和刘孝标注所记的人物事迹,一一寻检史籍,考核异同;对原书不备的,略为增补,以广异闻;对事乖情理的,则有所评论,以明是非。同时,对《晋书》也多有驳正。所以很有学术价值。1984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徐震堃的《世说新语校笺》,此本系以嘉趣堂本为底本,校以唐写本、董刻本、沈宝砚藏本、明代凌濛初刻批点本及思贤讲舍本等。其校笺则注重训解文字,同时又以史籍与本书考核异同。故此本可与余嘉锡本相得益彰。

最早为《世说新语》作注的人是南朝齐人敬胤,他的注本已经亡佚,今仅存五十一条其中十三条无注,见汪藻《考异》。流传至今而最负盛名的旧注本,是南朝梁人刘孝标的注本。刘孝标博综群书,所引史书、地志、家传、谱牒等书籍达四百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这些古籍十之八九已经亡佚,所以刘孝标的注除了注文本身具有赅洽、详密的特点外,其引书的宏富向来为辑佚家视为珍宝。目前所见《世说新语》的重要版本都是刘注本,因此刘孝标的注与《世说新语》原书已经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了。建国后也有部分注释本,主要是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本。

从宋代开始,就出现了《世说新语》的评点本。最早对《世说新语》批点的是南宋刘辰翁。他和刘应登、王世懋等人的批点,见明代凌濛初刻印的套色印本,八卷。此外还有明代王士贞的批点本,八卷,万历十四年(1586)余碧泉刻印。李卓吾批点本,二十卷,明代万历十四年太仓王氏刻本。这些评点本后来都没有重印过。

从七十年代开始,《世说新语》在国外开始有了译本。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Univeraity of Minnesota)1976年出版了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的英文译注本;日本明治书院1978年有目加田诚等人的日文译注本。

《世说新语》现存的版本都是分成三十六个门类,这是删改后的面貌,原本曾有过四十五门、三十八门和三十九门几种情况。四十五门本就是原来的十卷本,董彝的跋语说:“古《世说》三十六篇。世所传厘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三十八门和三十九门本都见于汪藻的《叙录》,他说:“三十八篇,邵本于诸本外,别出一卷,以‘直谏’为三十七;‘奸佞’为三十八。唯黄本有之,它本皆不录。三十九篇:颜氏、张氏又以‘邪谄’为三十八,别出‘奸佞’一门为三十九。按二本于十卷后,复出一卷,有‘直谏’、‘奸佞’、‘邪谄’三门,皆正史中事而无注。颜本只载‘直谏’,而余二门亡其事。张本又升‘邪谄’在‘奸佞’上,文皆舛误不可读,故它本皆削而不取。然所载亦有与正史小异者,今亦去之,而定以三十六篇为正。”

《世说新语》与魏晋人物品藻

人物品藻是汉代以来兴起的一项社会活动,它先是与汉代以来的政治选举制度有关。汉代任用人才的途径主要是“察举”和“征辟”两种方式。察举是由地方通过对人物的考察评议,自下而上地推荐人才;征辟则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地发现和任用人才。二者方法不同,但都要以对人物品行的考察评议为依据。这就使人物品评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从而大大增强了人物品藻的社会意义,并且对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行为产生直接的制约和影响。特别是当时地方上的察举活动往往是由名声很高的名士来掌握,《后汉书·许劭传》上说:“初,劭与靖(邵从兄)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后来人们干脆把人物品评叫做“月旦”了。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人们都迫切地希望自己得到外界较高的

评价。对此,《世说新语》有真切的记载。如“品藻”篇中记载当时人们把温峤划在第二流中的上品,所以每当那些名人高士在谈论第一流的人物快要结束时,温峤总要脸色尴尬地几乎无地自容。这说明他对自己居于二流地位是何等的害羞和不甘心,从而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外界的评价是何等重视。

正因为人们对名声是如此重视,所以有的人干脆自封一流,以引人注目。“品藻”篇又记载一次大将军桓温问清谈大师刘劭说:“听说会稽王司马昱近来讲水平很有进步,是吗?”刘劭回答说:“是很有进步,不过他仍然还是第二流的人物。”桓又问:“那么谁是第一流的人物呢?”刘答道:“当然是我这样的人了!”

至于在言谈中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胜过别人的人,更是大有人在。以殷浩为例,当晋简文帝问他比裴頠如何时,他的回答是“故当胜耳!”外界舆论对殷浩和桓温的评价差不多,认为二人齐名。但二人互不服气,桓温问殷浩:“你比我怎么样?”殷浩回答:“我和我自己周旋已久,还是觉得自己好!”而桓温则对别人说:“小时候我和殷浩一起用竹竿骑马做游戏,常常是当我玩够了把竹竿丢掉,他才开始捡起来玩,所以他当然应当在我之下。”这些都反映出人物品藻风气对人们心态的重要影响。

从书中的一些故事中还可以看出当时人物品藻活动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如有的直接根据人物外形进行评价。如“容止”篇记载刘惔对桓温评价道:“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他从容貌入手,看出孙权、司马懿和桓温三位雄才大略的相同之处,正是通过外形来确认一个人的才性的范例。另如潘滔在王敦少年时便从他目如马蜂、音如豺狼的形象中看出其野心家的本质(《世说新语·识鉴》);王浑的妻子钟夫人在为女儿择婿时,从形体和骨相中,看出此人虽有才干,但寿命不长,所以不能把女儿嫁给他(《世说新语·贤媛》),都是这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交谈来品评人物。刘邵在《人物志·材理》

中认为,依言知人也是人物品藻的重要途径。在玄学兴起、清谈盛行的年代,言语谈锋就显得更为重要。《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吴人张凭来到洛阳访问刘惔时,先受冷遇,很快便以谈锋获得盛誉,不仅使刘惔、王濛等清谈大师震惊,而且连晋简文帝经过亲自谈话后,也称之为“勃率为理窟”,立刻任用为太常博士。

还有一种途径是根据人物行为本身来考察或评价人物。由于汉末以来有一些名实不副的伪名士,所以很多玄学家特别注意从人物行为中来判断其人格高下。如: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回:“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世说新语·德行》)

王朗的行为有始无终,华歆的行为有始有终,在二人行为的对比中作出评价,就令人信服。另如华歆与管宁在锄菜和读书时对外界干扰的不同反应(《世说新语·德行》),桓温摆下鸿门宴,准备对谢安、王坦之下手时二人截然不同的神态(《世说新语·雅量》),都可见人们如何根据人物行为对其评价。

不过,书中记录的人物品藻内容价值最大的,还是以形象的故事,表现出人物品藻由社会的政治需要而转为审美行为这一鲜明的时代色彩。

汉末以来,社会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中央政府的集权力量大大削弱,曹魏政权在政治、经济上不得不依靠门阀士族的支持。因为当时士族地主庄园经济是当时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此,魏初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很快就被门阀士族阶层所把持和垄断。《晋书·刘毅传》所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说明当时大族已经牢牢掌握人物品藻和官吏任用的大权。在这种情况下,九品中正制不过是门阀士族结党营私的美丽装饰和例行程序,

而人物品藻也就失去了它对社会政治生活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这一变化,迫使人们把人物品藻的目光由实用功利转向对人物的个性、智慧、才能的高度重视和观察批评,从而使魏晋两代的人物品藻,更多地带有超功利的审美色彩。这一现象,在《世说新语》中表现得极为充分。

东汉“清议”运动前后对人物的品评是重德行的政治性人物品藻,汉末魏初在曹操“唯才是举”原则指导下的九品中正制是重政治之才的人物品藻,而魏代正始(240—249)以后的人物品藻则把人的主体个性及其相关的情感才能放在首位,并且十分注意从美的观念出发,对人的个性、情感和才能加以品评。如:

桓宣武平蜀,集参僚置酒于李势殿。巴蜀缙绅,莫不来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气,加尔日音调英发,叙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其状磊落,一坐叹赏。(《世说新语·豪爽》)

桓温所谈论的“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的内容,虽然与政治军事相关,但最后的落点在“人”、“才”二字,这说明他的关注点在人的才能。况且在座人们所感兴趣的,主要也是在于桓温那磊落之状,雄情爽气,以至使“一坐叹赏”。很显然,这里美的取向更胜于实用的政治评论。

因为人格美在人物品藻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属于人格美的才能和情感就格外受到关注。《世说新语·品藻》:“孙兴公、许玄度皆一时名流,或重许高情则鄙孙秽行,或受孙才藻而无取于许。”倘若让汉代的品评家来品评这两个人物的话,那么至少孙绰的“秽行”是被彻底否定的依据。而在晋人看来,这种“秽行”并不影响对其才藻的欣赏。至于许询的“高情”更是当时人们普遍追求的人格美: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世说新语·任诞》)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

此为试读,需变元宝,DI请向: www.CPbook.com